

#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生态范式及其效应

罗迪江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6)

**[摘要]** 生态翻译学已成为翻译学发展的新增长点,也促成当代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态范式。生态范式开启了本体论、方法论、人本论与目的论等若干新的问题域转换,充分彰显了生态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具有深远的范式效应:它消解了翻译研究的简单性思维模式,建构一种整体的复杂性思维模式;推进了翻译理论、翻译模式与翻译实践有效的方法论融合;对争论的分析和辩驳为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进路提供了有力辩护与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生态范式; 范式效应; 问题域转换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1-0090-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12

翻译研究的发展进程不仅是翻译概念的变化,而且是翻译思维中把握了的研究范式的变化。翻译概念与研究范式的变化,贯穿于翻译学界探讨翻译现象与翻译过程之中。“我国当代译论的轮廓与发展脉络,展现了我国学者追随国际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思维进路和渐进轨迹,跟着西人的脚步,经过‘多重转向’……每一次途径的转变,在方法论上带来新的变化,带动译学研究的进步”<sup>[1]</sup>。这表明了翻译研究正朝向后现代性的多途径与多元化发展,其视界更新与范式更替显示出翻译研究的当代生命力,不仅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为独特标志的生态范式,不断地展现出生态翻译学本身的思想活力与范式魅力。生态翻译学是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照,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sup>[2]</sup>。简而言之,它是从生态学视角为翻译研究寻找一个相对可靠基础的元科学,将文本生命、译者生

存与翻译生态视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翻译研究范式<sup>[3]</sup>。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视角、方法的转变都显示出范式转换的特征,自身独特的生态范式不仅开启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新问题域转换,而且充分彰显了生态翻译学具有深远的范式效应。

## 一 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生态范式的兴起

当翻译学界面临着“翻译研究早已成为独立学科却日益丧失了活力与创新力”<sup>[4]</sup>“犹如一条失去主河道的河流向四下漫溢,既看不到主流也看不到流向”<sup>[5]</sup>的困境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既为翻译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又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开放性的、复杂性的、兼容并蓄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将全部翻译活动视为一个动态的、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sup>[6]</sup>。随着生态翻译学的滥觞,生态范式日益显示其丰富内涵与鲜活阐释力,其研究发展已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翻译定义,已经从关注以对等性为目标的语言转换、以文化语境为基底的跨文化转换,转向到了研究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整体并以适应选择为阐释基底的多维转

**[收稿日期]** 2021-1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资助(编号:18BY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译者中心理论体系建构的生态理性研究”资助(编号:19XJA7400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译论研究的中国叙事:生态翻译学构成性特征及其学术定位研究”资助(编号:21NDJC190YB)

**[作者简介]** 罗迪江(1974—),男,广西忻城人,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教授。

换。生态范式蕴含着明显的标志性特征:(1)生态翻译学具有很强的术语索引之力,既能够索引出诸如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适应选择、适应性选择、选择性适应、文本移植、生态平衡、适者生存等等生态范式术语,而且能索引出诸如“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适应选择”这样的翻译事实与翻译发现,其中特别强调“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存在重要的规约作用,译者的译介活动应顺应时代潮流,产生贴合时代需求的译本,使得翻译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sup>[7]</sup>。(2)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不断地获得丰富与拓展,既有“四译说”<sup>[8]</sup>的扩充,还有“绿色翻译观”<sup>[9]</sup>的推进。(3)生态翻译学是一个以生态理念、生态认识贯彻于翻译研究且以生态思维理解与说明翻译而具有生态化特征的理论体系。(4)西方生态理论与东方生态智慧的融会贯通、全球性生态学术思潮的引领为生态翻译学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研究议题。传统旧议题与现代新主题交织在一起,促使生态翻译学进一步加强对翻译学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些重要标志预示着未来生态翻译学研究将呈现一个独特的生态范式图景,形成一种明显的学术流派。

按照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是指常规科学实践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共同信念<sup>[10]</sup>。从本质上讲,范式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其中最关键的层面是对学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sup>[11]</sup>。进而言之,生态范式构成了生态翻译学框架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界定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为研究对象,以“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为何译”为问题域,以翻译文本、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以生态理性为研究视角,对等性原则让位于适应性原则,原文/译文中心让位于译者中心,微观语言结构描写让位于宏观生态理性诠释等等。毋庸置疑,生态范式是由生态学作为元科学的思想驱动(idea-driven)逐步形成的,它是以新的理论思想与新的研究视角来摆脱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在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就是以新的研究范式对翻译研究进行重新设问、解答与布局。

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相比,生态范式展示了翻译研究以生态思维与整体论思想来考察与审视翻译现象,它不仅呈现了明晰的翻译研

究态势,而且展示了独特的复杂性思维模式。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具有生态范式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是一个具有学科范式转换的显著特征,这是因为生态翻译学:(1)具备范式演变的历史性。生态范式是随着21世纪初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与生态翻译学的兴起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它是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的具有历史性的转换更迭,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语言转换或跨文化转换,而是一个需要能够超越语言转换与跨文化转换而以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相互交替为核心的复杂性与整体性的多维转换模式。(2)具备范式统摄的总体性。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路径以生态理性为视角,围绕着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互联互动,各个视角的研究又最终融入并归宿于生态理性的视域之中,既形成统摄整个翻译学科的新问题域,又能有效凝聚成为一个普遍的学术共同体。(3)具备范式的质的规定性。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既有量的扩张,更有度的突破与质的提升,它强调整体性与复杂性研究方式,能够阐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学科共享承诺,既形成翻译研究中普遍承认的生态理论意旨、思维特征与价值取向,又形成了包含着对翻译整体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的“四译说”思想。四译说是以“何为译、谁在译、如何译、为何译”为载体的对生态翻译学本体论、人本论、方法论与目的论“四位一体”的生态整体与“一分为四”的理论构建辩证模式。生态翻译学是在21世纪初翻译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源泉,是在中国土壤之上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新思想活力,这个由思想驱动而成的生态范式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东方生态智慧与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以问题域转换来建构自身的本体论信念、方法论路径、人本论关怀与目的论取向。

## 二 生态范式开启了生态翻译学的问题域

“一个学科的理论发展是否繁荣并不仅仅取决于概念的推陈出新,而在于理论建构过程中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即理论能够解决什么问题?”<sup>[12]</sup>生态翻译学不仅在反思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基础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新的理论概念体系,而且对探讨新的翻译理论与解决翻译现实问题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生态范式不仅与传统翻译基本问题有着本质的渊源,也与生态翻译学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其问题域不仅涉及旧议题的深化与延展,更重要的

是开启了生态翻译学的若干重要的新问题域。可以说,立足于一种新研究范式的生态翻译学并从整体论视角出发对西方译论问题域进行反思与探讨就成为当代中国译论研究中问题域转换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向<sup>[13]</sup>。问题域转换蕴含着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生态范式引发的观念嬗变,通过这种观念嬗变,开启了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域、方法论问题域、人本论问题域、目的论问题域的自我确认与自我发展之路径。

### (一)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域

生态翻译学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超越,开启了以适应选择为元概念来拷问“何为译”。综观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它的本体论基础在于翻译适应选择论,而翻译适应选择论可以看作是生态翻译学背后的元理论。生态翻译学的显著特点在于,生态范式既不是对理论体系局部性的变化或修补,也不是翻译理论的外在整合,而是整体性的问题域转换。相对于西方翻译研究来说,生态翻译学强调以生态化与整体论为方式来考察与审视翻译,是一种“中庸之道”,对于不同的学理视阈与理论思想能够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确切地讲,西方翻译学多专注于雕琢各自理论自身的洛可可花纹,却不太热衷于理论之间的整合与贯通<sup>[14]</sup>。那么,重新思考“何为译”的本体论问题域成为了目前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重心内容,也是自身的生态范式得以确立的根本所在。

“何为译”是探讨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域,它立论于“翻译即适应选择”理念,促使生态翻译学脱离传统翻译研究的范式,形成独具一格的生态范式。根本而言,生态范式是以生态思维来解释与说明翻译,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生态思维并不是否定或削弱简单思维范式下的二元对立、无限理性与非整体性等思维方式的存在性……,而是通过复杂性思维范式去挖掘翻译背后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理性、生态整体与生态智慧思想,从而在生态思维下揭示翻译的复杂性特征<sup>[15]</sup>。正是翻译的复杂性特征,生态范式视域下的“何为译”涵盖了“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应当成为什么”三个相互作用的问题域。“是什么”关注的是生态翻译的内在本质:翻译即适应选择;“意味着什么”强调生态翻译的具体方法:翻译即文本移植;“应当成为什么”涉及到翻译的生存状态:翻译即生态平衡。“何为译”将适应选择、文本移植和生态平衡纳入一

个更为广阔的生态翻译学本体论体系之下,既关涉到文本移植与文化生命之间的本质关联,又涉及到翻译生态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内在关系;既让我们开始反思传统翻译研究关于“何为译”的思想,又让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促使翻译研究返回更广阔的生态理性思想。“何为译”问题域的探讨,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概念框架、理念基础、理论出发点,并催生相应的翻译事实、翻译理论与翻译原则,实现翻译研究的问题域转换。

### (二)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问题域

生态翻译学是对传统翻译学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反思与超越,通过引入生态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如何译”的方法论问题域,促使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域的转换。“如何译”问题域的转换意味着生态翻译学基于传统翻译学简单地由翻译理论(宏观)与翻译实践(微观)组合而成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之上,要建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由翻译理论的宏观方法论、翻译模式的中观方法论与翻译实践的微观方法论组合而成的“一分为三”辩证思维模式。

“如何译”依托于宏观生态理论并借此拓展其方法视野,成为生态翻译学极具探讨性和反思性的方法论问题域,它为翻译模式与翻译实践的沟通融合构建了平台,为翻译方法与翻译理论的交流探讨提供了载体。中西翻译理论常以一分为二为方法论而形成宏微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导致基于宏观与微观方法论之间的中观方法论的遗落及其整体性的分离,使翻译方法论陷入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脱节的尴尬境地。“如何译”的内涵越得到丰富与扩展,就越能加速传统方法论问题域的转换,越能推动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建构。“如何译”的问题域转换是要消解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状态,回归翻译研究的整体论思想;它体现了宏观-中观-微观方法论思想的整体性与辩证性,超越了二元论思维模式,从而确立以生态范式为取向的翻译理论宏观方法论、以适应/选择为取向的翻译模式中观方法论、以文本选择为取向的翻译实践微观方法论组合而成的一分为三辩证思维模式。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一分为三辩证思维模式具有自我完善与理论建构的特征,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工具和手段,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对其理论本身进行修正和补充,它所具有的整体论思想为翻译分析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启迪性的思路<sup>[16]</sup>。

### (三)生态翻译学的人本论问题域

生态翻译学是对原文/译文中心忽视译者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反思与反拨,重新演绎翻译学的人本论精神,重新审视译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者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问题,开启了追问“谁在译”的人本论问题域。于是,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问题:(1)译者生存如何;(2)译者如何生存;(3)译者生存为何。它们分别探讨译者的生存境遇、译者中心及其视域下的译者主导、译者责任、译者发展。译者对翻译的认识正是在“译者生存如何”“译者如何生存”“译者生存为何”及其对翻译存在的领悟的基础上产生,因而翻译存在根源于译者的生存境遇,并从属于译者的生存筹划与翻译实践<sup>[17]</sup>。显然,“谁在译”问题域的转换实际上是消解原文/译文中心忽视对译者的生态关怀,回归译者的生态关怀,回归译者的人文关怀,回归译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谁在译”在追问“译者生存如何、译者如何生存、译者生存为何”过程中重新确立译者在生态翻译学中的中心地位,它不断地超越译者现有的生存境遇,促使译者从微观层面上的译者主导向宏观理性层面上的译者责任不断靠拢,从翻译过程中找回被遗忘的译者存在,从而有效地实现译者发展。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使得过去曾经处于隐形的、被遮蔽状态的译者开始得到更多关注<sup>[18]</sup>。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不仅建构起译者中心的生态理念而且也是对译者生存境遇的生态关怀。可以说,如何解决“译者生存如何、译者如何生存、译者生存为何”问题,同时规避原文/译文中心的研究偏颇,成为当前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域。

### (四)生态翻译学的目的论问题域

生态翻译学是对翻译之“行为”(译)与翻译之“作为”(为)的整体性思考,以适者生存、强者长存、译有所为为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的整体统一开启了追问“为何译”目的论问题域。“为何译”问题域的转换是具有突破性与广阔性的,它既要审视翻译之前的“事先预防”,更要考察翻译过程中的翻译之“行为”,亦要关注翻译过后的翻译之“作为”,从而消解传统翻译研究只重视翻译之“行为”的单一性与片面性。因此,“为何译”问题域所指向的就是译有所为。译有所为是一个由译者主导的包含翻译活动之“译”与“为”的双重结构,两者是同一个翻译行为的两个不同侧面,处于翻译活动的不同层面之中,

“译”是横向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为”是纵向的,是翻译之后呈现的翻译作为。“译”的意义必然在“为”,“为”的意义在于“译”的适者生存。“译”与“为”统一于译有所为,其所蕴含的深刻含义:“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必须在“为”中实现“译”背后隐藏的目的性。译有所为本身就是一种翻译的有所作为,通过翻译活动而成就翻译的价值意义。

“为何译”问题域展开为翻译的适者生存、强者长存(内在目的)与译有所为(外在目的):内在目的乃是适者生存、强者长存;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是通过外在目的“译有所为”来实现的。正是译者的译有所为提升与增强着译文生命的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的现实性;“为何译”在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的共同驱动下才能促使翻译创造出合乎目的性的译文,创造出译文生命在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法则——适者生存、强者长存,创造出译者在生态翻译中的生存之道——译有所为。因此,“为何译”问题域不仅要揭示生态翻译的内在目的(适者生存、强者长存),而且担当着对译有所为的认知并且提升为“译就是为”作为外在目的,从而有效地揭示“译”与“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 三 范式效应:消解传统翻译研究的简单性思维模式

实质上,生态范式本身就蕴涵整体论思想,它消解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的简单性思维模式,建构起一种整体的复杂性思维模式。长期以来,语言学范式几乎支配和垄断了整个译学界,多年来,语言转换的对等性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原则。然而,这种对对等性研究的崇尚,虽然为翻译研究的语言结构描写、微观语言规定、语言转换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诠释与描述,但是它“不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艺术作品的艺术再现,把主要关注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理论分析也往往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而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这一更广阔的内容,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目标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sup>[19]</sup>,因此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困境而似乎陷入翻译研究的范式危机。换言之,语言学范式聚焦于语言内部结构,追求语言转换之间的对等性而缺失了来自诸如文化、社会、意识形

态等外部因素的理性限制,这样外部因素的限制被遮蔽在追求对等性的内部结构之外,语言内部结构与语言外部描写难以有效地进入翻译研究的整体认知。

当语言学范式陷入了危机时,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应运而生,它不满意于微观的语言层面的研究,把翻译视为宏观的跨文化转换,突破了语言学范式的微观层面限制,开始挖掘诸如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制约因素,使翻译研究不断地扩张并越来越深入到了翻译更为广阔的领域。翻译的文化研究则把翻译从原文中心解放出来,建构译文中心理念,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进行描述性研究,从而力图对诸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文本外部因素等语言学难以深入分析的翻译问题与翻译现象提供了解释。但问题是,在理论狂欢之后,却留下了未解决的问题:翻译问题离不开语言,翻译本体问题日益凸显<sup>[20]</sup>;而译学研究领域虽扩展,研究方法虽多元,而其学科边界却越来越模糊<sup>[21]</sup>。伴随着文化转向的产生,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度地张扬,翻译即操纵、翻译即吞噬、翻译即改写等理念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这就需要我们反思译者主体性的膨胀带来功利主义翻译行为的挑战,以及翻译市场决定论的冒进及其导致翻译价值的丧失,对于当代翻译实践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所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问题上先后遇到困境,是因为翻译研究要么将其限制于语言范式的狭窄的研究领域,要么将其放任于文化范式的外部研究之中,使翻译研究毫无目的地游离于语言内部结构或者徘徊于语言外部描写,难以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形成整体性综观。而生态翻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以及生态范式的进一步确立却能避免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所遇到的困境。

首先,生态范式超越了传统研究范式,打破了单纯的语言转换或跨文化转换模式,其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转向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强调在生态翻译环境中符合语言维、文化维、社会维、交际维、认知维等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那么,生态翻译学在翻译解释与描述方面逐渐走向多元化,在翻译研究对象走向了整体性与复杂性,融合了语言学派的语言转换与文化学派的跨文化转换并在内涵与外延上不断地得到拓展与延伸,在整体上

呈现出多维适应与多维选择并存的多维转换模式。它倡导翻译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多样性、整体性、动态性与复杂性,强调翻译研究的语言内部结构与语言外部描述的辩证统一,既避免翻译学的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又突显了翻译回归和追问翻译本质的确定性。

其次,生态范式推进了翻译理论、翻译模式与翻译实践的有效方法论融合。生态翻译学一直强调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最终又服务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目的是认识翻译本质,翻译实践的目的是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解释。生态翻译学通过追问“如何译”问题域,建构一种“宏观-中观-微观”方法论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模式:宏观方法论以生态范式为基准,形成翻译理论的宏观思维方式;中观方法论以“翻译=适应+选择”为模式,构成翻译模式的中观思维方式;微观方法论以“翻译即文本移植”为取向,形成翻译实践的微观思维方式。一分为三观照整体,因而不放弃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思考;它重视关系,因而将概念或实体放在一个三元关系模型中思考整体和部分的本质和功能<sup>[22]</sup>。正是在一分为三辩证思维模式的驱动下,翻译研究的宏观-中观-微观方法论层次分明,相辅相成,宏观方法论侧重于翻译理论的认知,中观方法论着重翻译模式的建构,微观方法论着重对翻译实践的示范。在生态范式的视域下,宏观、中观、微观方法论是三元关系,宏观方法论制约着中观方法论中的翻译模式,翻译模式决定着微观方法论中翻译技巧的运用,这符合生态翻译学的和谐平衡与整体统一的观念。

最后,生态范式对争论的分析和辩驳为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进路提供了有力辩护与新的研究视角。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视角面临一定的挑战和质疑,由此引发了不少学者对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争论:有部分学者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尚不成熟,其奉为核心理念的译者中心、事先预防、事后追惩、适应选择等仍有待修订完善<sup>[23]</sup>;将适应选择论视为生态翻译学的中坚力量,忽略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学科的大发展相悖<sup>[24]</sup>;生态翻译学虽然名为生态研究范式,但却摒弃了生态哲学的核心理念,对东方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解读亦存偏颇之处,理论构建不尽科学<sup>[25]</sup>。面对质疑与争论,以胡庚申为代表的生态翻译学团队从不同视角进行有说服力的阐释与辩护,而且在此他们又阐释了生态范式开

启当代翻译研究的本体论、方法论、人本论与价值论的新问题域的转换,使得翻译研究的本体论信念、价值论取向、方法论路径、人本论关怀、认识论视域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内在地联在一体,形成一种把握翻译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sup>[26-27]</sup>。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迎合了全球生态思潮,有利于充分汲取东方生态智慧,再加上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以及生态理性的具体指导,目前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sup>[28]</sup>。可以说,上述质疑均不会动摇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而对争论的剖析贯彻了我们对生态范式的深入阐释与持续发展。面对质疑与批评,生态翻译学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地发展、挖掘与更具体地建构、阐述与诠释翻译现象与翻译过程的理论体系,才能在辩护与捍卫的过程中建构系统、有影响力的生态范式。

#### 四 结 语

生态翻译学引发的范式转换将直接带来本体论信念、认识论视域、方法论路径、价值论取向、人本论关怀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促使翻译研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域。综观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生态范式的转换,不难发现,探寻翻译研究之途,不是翻译研究各种范式转换的决裂,而是彼此之间不断碰撞、相互继承、相互质疑从而不断丰富翻译研究范式的包容性与融合性。生态范式将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平台解决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融合问题,促使翻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当代翻译研究的转轨,即从简单性思维范式转向复杂性思维范式。就此而言,生态翻译学力求的目标在于理解与把握生态范式的复杂性,它不仅是当代翻译研究进程中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对话者,而且是当代翻译研究进程中生态范式的建构者与强有力的推动者。无论如何,翻译研究的发展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已潜在地转向复杂性研究,促使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复杂性范式去理解与把握翻译。这既是当代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当代中国译论发展的一大趋向。

####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J]. 中国外语, 2017(5): 93-100.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诠释与建构[M].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13: 11-12.

- [3] 罗迪江. 当代翻译研究的机体主义建构: 翻译生命观的构想[J]. 中国翻译, 2021(5): 15-24; 191.
- [4] BASSENT 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a Cross-roads[J]. Target, 2012(1): 15-25.
- [5] 吕俊. 目前我国译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 上海翻译, 2014(3): 1-6.
- [6] 叶从颖, 殷习芳.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王船山诗词情景契合英译再现初探[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25-31.
- [7] 魏薇. 翻译生态环境的规约性: 以中医典籍英译的历时性研究为例[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23-126.
- [8] 罗迪江. 论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四译说”思想[J]. 翻译论坛, 2018(2): 21-26.
- [9]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绿色翻译探析[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88-96.
- [10]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43.
- [11] 郝戈.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基于《资本论》研究引发的新范式[J]. 哲学动态, 2018(6): 20-28.
- [12] 穆雷, 傅琳凌. 翻译理论建构的原则与途径[J]. 中国翻译, 2018(3): 9-18; 127.
- [13] 罗迪江. 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角[J]. 中国翻译, 2019(4): 34-41.
- [14] 杨镇源. 基于正念的翻译学元理论认知思维探析[J]. 外语学刊, 2018(3): 98-102.
- [15]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复杂性思想的复杂适应系统阐释[J]. 山东外语教学, 2021(3): 98-107.
- [16] 罗迪江.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109-114.
- [17] 罗迪江. 译者生存与翻译存在关系的生存论建构[J]. 外文研究, 2021(1): 60-65; 108.
- [18] 王岫庐. 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J]. 中国翻译, 2014(4): 21-25; 128.
- [19] 谭载喜.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J]. 外国语, 2005(1): 53-59.
- [20] 刘性峰, 王宏. 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J]. 外语研究, 2016(2): 87-91.
- [21] 黄忠廉, 方仪力. 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J]. 中国翻译, 2017(4): 5-10; 128.
- [22] 庞秀成, 冯智强. 一分为三翻译观何以可能? ——一个元思维方法论的构想[J]. 上海翻译, 2020(1): 7-13.
- [23] 王宏.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J]. 上海翻译, 2011

- (4):10-11.
- [24] 陈水平. 生态翻译学的悖论: 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 [J]. 中国翻译, 2014(2): 68-73.
- [25] 尹穗琼. 生态翻译学若干问题探讨: 与胡庚申教授就《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中的部分观点进行商榷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3): 56-62; 81.
- [26] 胡庚申. 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  
议[J]. 中国翻译, 2014(6): 86-89.
- [27] 罗迪江, 胡庚申. 关于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对尹穗琼商榷文章的回应[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24(3): 63-68; 81.
- [28] 冯全功. 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与作用分析: 以生态翻译学为例[J]. 上海翻译, 2019(3): 38-43; 94.

## On the Eco-Paradigm and its Effects of Eco-Translatology Study

LUO Di-jia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Eco-Translatology has become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present, which leads to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gradually forms a certain influential eco-paradigm. Eco-paradigm opens the shifts of several new problem domains including ontology, methodology, humanism and teleology. In a sense, this fully manifests that the eco-paradigm of Eco-Translatological study has a far-reaching paradigm effect in th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ffects include two aspects: firstly, it transcends the mode of simple thinking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nstructs a holistic mode of complex thinking; secondly, it promot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ethodology among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mode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rdly, it provides the ecological path of Eco-Translatology for a powerful defense and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by means of the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of the debates about the relevant ideas of Eco-Translatology.

**Key words:** Eco-Translatology; eco-paradigm; paradigm effect; problem-domain shifts

(本文编辑:魏月华)